



欧洲的中石器时代*

◆ (美)道格拉斯·普赖斯(T. Douglas Price)

著

◆ 潘 艳

译

(复旦大学文博系)

◆ 陈 淳

校

过去十五年间 欧洲中石器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华沙和波茨坦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还有一些小型研讨会。许多地区和国家的综述付印面世。

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遗址发掘报告问世。通讯《中石器集刊》(Mesolithic Miscellany)为半年刊,报道最新信息和研究报告。科茨洛夫斯基绘制了欧洲中石器地图。西欧中石器人类骨骼的目录也已出版。中石器时代研究的前辈,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中石器时代的序幕》中,对人类在欧洲冰后期初适应的性质与意义做了重要论述。

显然,对欧洲史前史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信息量激增,我甚至无法在这短短的几页中概括其主要进展。我将在本文中尝试讨论中石器时代的一般性质,以一种“读者文摘”的笔法,集中介绍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及其成果,结尾是欧洲冰后期农业前史前史研究和阐释的某些动态与趋势。

时间与空间

本概述必须以强调欧洲中石器的环境状况为起点。由于深入研究的历史悠久,因此欧洲西北部可能是全世界自更新世末至冰后期初对气候和动植物群变迁了解最为透彻的地区。实际上,每个史前学者都熟知冰盖、苔原、桦、松以及栎树森林的演替。

然而,这些“关键”的序列,连同详细的信息和极佳的保存状况,往往会左右我们的想法,干扰我们对这一时期欧洲其它地区景观的理解。例如,欧洲东南部的环境与近东非常相似,后者是许多早期作物驯化的核心地区。爱琴海与巴尔干地区更新世至冰后期条件的过渡并不剧烈。证据表明,前农业

适应(prefarming adaptation)与该大部分地区旧石器晚期的适应并没有什么区别。仅有少数地区可以分辨出中石器阶段。

近更新世末,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法国大部在内的欧洲南部,生活着许多晚些时候将在北欧冰后期环境中出现的动植物种类。比如,西班牙北部的广大地区主要生长着落叶栎树林以及众多温带动物——赤鹿、狍子和野猪,同时驯鹿开始放弃德国平原向北转移。

实际上,对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地理和环境的思考。东南欧和南欧的史前学家一直将冰后期的前农业适应称为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在这些地区,环境与人类适应的变化看不出来,加上动植物驯养引入较快,严重模糊了中石器时代的可见度,也削弱该课题的研究力度。

中石器时代在西北欧最为显著,冰后期变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那里,居住在苔原上的驯鹿狩猎者被开拓树林与滨海资源的人群所取代,农业来得很晚。中石器时代的性质与持久性很容易被观察和记录下来。

因此,“中石器时代”术语的定义成为一个难以把握和棘手的问题。虽然在过去五十年里赋予了这个术语以无数的特征,但是日益清楚的是,该术语仅具有时间范畴上的意义。

考古遗存显示出无穷的变异,包括时间、空间与形式。要想将各方面都一一对应,以定义年代学和文化单位都是徒劳的。中石器时代既不仅仅与细石器的使用相伴,也不只是与开拓森林和滨海资源关联,也与狗的驯化无关。

* 译自:T. D. Price, The European Mesolithic. American Antiquity, 1983, 48(4): 761~778.

中石器时代仅仅是指农业引入前的冰后期阶段。为该术语附加更多特定的形式特征只会削弱其实用性。这一阶段的起始时间可依惯例定在距今10,000年前,其结束时间则因地而异。粮食生产在欧洲的扩散是随时间推进的现象,它大约8000年前始于东南部,约5500年前抵达英伦诸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

根据这一背景,我仅从局部的时间意义来使用“中石器时代”这一术语,也许,它指冰后期初的狩猎采集者更有意义。但是,由于“中石器时代”作为使用甚广的词汇有着悠久历史,因此,本文通篇将使用该术语,并声明这一术语仅指欧洲全新世初的觅食者,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含义。

最近的研究

欧洲东南部 对欧洲东南部中石器时代的了解实际上还不到二十年。虽然对该地区大部分的全新世初仍所知甚少,但某些研究项目的成果提供了一些了解。

对地中海东西侧大部分岛屿的占据直到新石器才开始。希腊基斯诺斯(Kythnos)的基克拉迪岛(Cycladic)报道的中石器时代人工制品和墓葬受到彻里的质疑。但是,早在12,000年前大陆居民对米洛斯岛上黑曜石的利用,证明了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群的航海能力。这一证据和这时期广泛利用海洋的其它信息,来自希腊阿戈里德的弗兰克西洞穴(Franchthi Cave)。1967年以来,对该遗址的研究提供了过去20,000年来人类在希腊南部居住的详细图像。

距今10,000年左右,弗兰克西的居住者开拓海洋资源和各种陆地资源。洞穴堆积存在狩猎赤鹿和其它大型动物、采集海贝与陆生蜗牛、以及利用多种野生植物包括扁豆、豌豆、开心果、杏仁果、野燕麦和野大麦的证据。遗址的季节性资料显示了全年栖居的可能性。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证据,弗兰克西10,000年之后的中石器遗存可以分为两大阶段。洞穴堆积表明,中石器早段当地某些陆生动物灭绝。但是,生计和聚落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情况未见有明显变化。中石器晚段遗存确实见证了食谱的重要变化,强化了对海洋资源特别是金枪鱼的更大依赖。这一深海鱼种重达200公斤,而且金枪鱼骨骼在弗兰克西洞穴地层所有大型动物骨骼中占到近50%。

炭化植物遗存大量增加,扁豆尺寸增大,被作为距今8500年前可能存在本地驯化的证据。诸如芜荑(经常与驯化种共生)等植物的出现,以及(石器微痕)存在“镰刀抛光”(sickle polish)增强了较为强化利用植物的看法。到距今8000年左右,操纵动植物都在弗兰克西得到证实,并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无论延续与变迁都能从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见到。

南斯拉夫已发掘的洞穴和旷野遗址,显示了与弗兰克西洞穴冰后期初的堆积很相似。蒙特内格鲁西北部奥德姆特洞穴(Odmuť Cave)的地层厚达1.5米,除维生的动物遗存外,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骨器。这些地层的年代距今约9000~7000年,基本上与弗兰克西所定的中石器年代一致。奥德姆特的动物遗存主要有山羊、赤鹿和鱼。骨器包括锥和凿、以及大量小而扁的鱼叉,其中有些带有精心刻划的几何形纹饰。石制品的序列表明,早晚地层之间存在几何形细石器式样上的过渡,约距今8700年后,梯形取代了三角形。

弗拉萨克(Vlasac)位于铁门(Iron Gates)地区多瑙河的低阶地上,对它的研究延长了巴尔干中石器时代的序列。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早于8000年前的第一层。河流阶地最早的聚落就始于自该时期,以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永久性居址为代表。该层至少有七处建筑,大致呈三角形,最大面积为4×4米,经常含石块围砌的火塘与墓穴。这些建筑面向河流,围绕着一个可能是圆形碎石平台呈半圆形排列,后者的直径近5至6米。第一层至少有24座墓,兼有土葬和火葬。陪葬品不多,但确实有赭石、鱼牙及人与动物的下颌骨。

遗址的动物遗存表明对三种主要环境带的开拓:(1)河狸、水鸟、乌龟,特别是重达100公斤的大鲶鱼,来自多瑙河;(2)赤鹿、野猪和其它大型动物,来自河谷的山坡林地;(3)欧洲野牛,来自河谷上的森林腹地。

骨、鹿角与牙质武器和工具(包括镐与鹤嘴锄)的生产相当广泛。与奥德姆特不同,该遗址鱼叉罕见,仅发现很少几件。带纹饰的器物有各种施彩或刻划的便携物件,包括小鹅卵石。弗拉萨克较晚的地层显示,居住并不十分固定,尽管聚落大致布局保持同样的格局。

铁门地区水电站工程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激起了对两岸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众多重要新遗址的研究,获得了该地区中石器与新石器时代大量的新

信息。也许期待达成共识还为时过早,而且对这些材料的阐释意见相左也很正常。某些学者提出,铁门富裕环境中定居的狩猎采集者朝着驯化的方向操纵他们的资源。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某些遗址中这些地层与晚期材料发生了混淆,较为瞩目的遗存与该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栖居有关。

欧洲南部 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冰后期初的历史鲜为人知。拉姆利和吉莱纳、罗佐、以及索纳维尔-博尔德总结了法国最近的工作。该地区许多被报道的研究继续集中于地层学、年代学和环境复原。在意大利,中石器时代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对史前史晚期以及古典文明考古过于关注。比亚吉对意大利北部的后旧石器时代做了有益的讨论,对格罗塔·德尔伍佐(Grotta dell'Uzzo)的发掘结果也为西西里与意大利南部提供了一份好的序列。在葡萄牙,最近仅报道了少数中石器研究,是关于莫伊塔·多锡巴斯提奥(Moita do Sebastiao)贝冢与其居住结构和墓葬,以及阿斯图里亚斯文化的类型学与年表。

另一方面,西班牙几个长期项目大大地增进了对冰后期适应图像的了解。坎塔布利亚、加泰罗尼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的许多项目,证实了从冰期晚期到全新世初环境的过渡。福特·佩雷建立了西班牙拉文特地区详尽的类型学序列。对加泰罗尼亚许多遗址的发掘,包括巴尔玛·德盖(Balma del Gai)和巴尔玛·德莱斯普鲁加(Balma de l'Espluga),证明了该地区后旧石器和中石器工业的连续性。坎塔布利亚的其它遗址位于西班牙北部海岸,它们的研究探讨了该地区阿齐尔和阿斯图里亚斯石器组合的关系。

在坎塔布利亚发掘的遗址,比如林瑟斯(Liencrec)、拉里埃拉(La Riera)和洛斯阿祖勒斯(Los Azules),提供了这一沿海多山地区人类适应性质的重要证据。阿齐尔文化在该地区主要出自内陆洞穴,以大量细石器、小型刮削器等人工制品为代表。阿斯图里亚斯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海滨适应,有半定居的贝冢,包含各种动物骨骼和阿斯图里亚斯“标准化石”——卵石镐。骨骼和其它有机质遗存表明大范围利用陆地和海洋资源。拉里埃拉遗址的氧同位素研究表明贝类的开拓是在冬季。

阿斯图里亚斯文化贝冢定在距今约9000~7000年。阿齐尔文化遗存年代略早,但是这两种遗存在距今9500~8500年有一段明显的重叠。洛斯阿祖

勒斯的晚期阿齐尔组合很有代表性,出土了一座罕见的含许多施彩卵石的男性成人墓葬。

斯特劳斯与克拉克以及勒纳认为,阿齐尔晚期遗存与阿斯图里亚斯遗存很可能是同类维生/聚落系统中的两个互补方面,包括海滨的大本营与内陆较为专门的觅食营地。该地区对陆地与海洋资源明显的强化开拓,出现于旧石器晚期到中石器时代。资源基础的多样化可能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

欧洲中部 对侏罗地区列斯贝格米尔(Liesbergmühle)IV、波美·道根斯(Baume d'Ogens)、伯斯玛滕(Birsmatten)以及其它遗址的发掘,证明了瑞士旧石器与中石器时代一系列的石工业和骨工业。但是,尽管有深入研究的悠久历史,加之良好的保存条件,瑞士中石器时代的年表仍然相当模糊。被命名的各种时期(阿齐尔、索沃泰尔、菲斯泰纳、奥根斯、“凹缺石叶/横刃箭镞/鹿角鱼叉文化层”)在地层学或年代学上难以相互对应。

怀斯报道了瑞士中部斯考兹(Schätz)7遗址出土的保存良好的骨角器,包括定在中石器晚期的锥、凿、箭镞和鱼叉。该聚落是一处约7000年前的季节性营地,在十二月至五月间被居住。该遗址的动物遗存以赤鹿和野猪为主。怀斯根据鹿角的证据,认为这个遗址原来位于过去的湖岸,是一个猎鹿者的冬/春季营地。

奇怪的是,瑞士中石器遗址的动物群中不见驯化的狗。而且,虽然研究中有仔细寻找植物遗存,保存条件也相当好,但该地区的中石器阶段仅发现榛果。

德国西南邻近地区的研究则确实为中欧的中石器时代提供了详细的年表,以及内陆地区河湖相适应性质的进一步证据。特别是贾格豪斯—霍尔(Jägerhaus-Höhle)遗址,提供了多瑙河流域人类在该地区自10,000至6500年前几乎连续居住的记录,这个地层序列证明了某些中石器人工制品在时间上的某些重要变化,能够将中石器早期的伯夫龙(Beuronian)文化分为三期。伯夫龙文化以距今8000年之后梯形细石器取代三角形细石器而与中石器晚期相区分(尚未命名)。贾格豪斯—霍尔和位于士瓦本·阿尔伯(Swabian Alb)的其它遗址如费尔斯达齐·劳特莱克(Felsdach Lautereck)和齐格纳费尔斯(Zigeunerfels)也出土了大型动物群,表明强化开拓赤鹿、孢子和野猪等主要猎物,还有鲤鱼和数量惊人的松貂,可能取用它的毛皮。

利用这些及其它遗址的材料,约基姆认为在多瑙河上游存在一种“双重”聚落系统。利用诸多特点如遗址规模、离水源远近、石器工具组合的构成、以及主要经济物种的生物与行为的某些方面特征,他建立了一个模型——以多瑙河边洞穴与岩棚遗址为代表的冬季营地,和可能分布在附近湖边的夏季营地。目前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检验这些假设。费德西(Federsee)湖边赫纳霍夫(Henauhof NW)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表明夏季栖居的鹿角证据。

英伦诸岛 过去十年见证了不列颠和爱尔兰中石器时代年表的重大变化。梅勒斯和雅各比将英国的中石器时代分为早晚两期。中石器时代早期(距今 10,000~8500 年)以宽石叶工业为特征,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马格尔莫斯石工业相近。定在距今 8500~55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农业出现之间的中石器晚期组合,是根据较小的几何形细石器、特别是不等边三角形细石器来确认。英国未见有欧洲大陆略早于 8000 年前出现的真正宽梯形细石器。中石器早期向晚期的转变,与向大西洋期橡树林为主的植被的过渡、以及因英吉利海峡被淹而使英国与欧洲大陆分开密切相关。

至于英国及其它地方中石器时代的生计,梅勒斯和克拉克都认为,在食物整体供应上,植食即使不是主要成分,也贡献不菲,特别是植食在大多数史前学家所采用的肉食模式中被低估或忽略了。克拉克还认为,许多不同的工具可能被用于采办和加工植食,比如鹿角锄作为挖掘工具来获取根茎,把细石器与细石叶插到磨碎植物的碾磨板上等等。但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榛果以外,现在几乎没有利用大量或多种植食的直接证据。

基于许多遗址石器组合的区别和推定的环境与气候差异,对英国中石器时代提出了一种冬夏有别的聚落模式。在该景象中,较冷的月份表现为低地较大的局部群体,根据不同地点开拓沿海或内陆资源。某些经济物种(特别是赤鹿)的集中、鹿类聚集时集体狩猎技术的特点、食物分享与实践、以及防止劫掠者的需求,会鼓励形成较大群体。较暖月份中较丰富但分散的资源(特别是植食),以及分享的需要和彼此设防,会在高地形成较小的局部群体和较频繁的移动。

大量贝冢和高密度的中石器遗址证明了海滨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西海岸。奥龙塞(Oronsay)岛的研究证实,仅在 5.8 平方

公里的一个岛上就有六处贝冢。约 5500 年前贝冢的内涵,凸显了食谱中鱼和贝类的重要性。令人惊讶的是,超过 90% 的鱼类遗骸来自同一物种——黑鳕鱼。蟹、鸟、海豹和榛果是主食的补充。来自鱼类耳石和其它材料的季节性证据表明,一年的不同季节利用不同的贝冢,该群体在这个岛上在一年的周期里居住相当长的时间。

跨过爱尔兰海,在桑德尔(Sandel)山及其它地点的发掘,提供了聚落与生计的新信息,并把人类向爱尔兰的迁移推前了约 1000 年。大约 9000 年前,桑德尔山使用直径达 6 米的大型居住遗址。这些遗迹通过半地穴、柱洞、以及各种火塘和其它窖学得以确认。后两类遗迹内的遗存包括各种人工制品、动物烧骨、以及炭化的榛壳碎片、野百合和野苹果的种子。动物以野猪为主,但是窖藏内也见有兔子。鱼和鸟类的骨骼很多,有锯鲛、鳗鲡、鲑鱼、鸭子、鸽子、松鸡、苍鹰和大黑松鸡。虽然班恩河谷的桑德尔山应该离海较远,但是食谱中却混杂有海洋资源(锯鲛和比目鱼)。大量居住建筑和动植物证据表明桑德尔山是全年居住的。

除了新发现,对较早的“经典”发掘一直在做重新评估。斯塔卡(Star Carr)可能是最著名的中石器遗址了,它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是这种系列回顾的对象。发掘者格拉厄姆·克拉克在“生物考古学”的一个案例研究中重新思考了该遗址。他假设,斯塔卡代表了赤鹿狩猎者的冬季营地,而在附近的奔宁山区(Pennine hills)应该会发现较小的夏季营地。

在对遗址动物骨骼上狩猎伤痕证据的一项思考中,诺埃-尼高指出,斯塔卡的大多数动物骨骼都堆积在水下,而非真正的聚落区范围内。她随后发现,遗址中物种数量统计的许多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赤鹿角过多。惠勒对斯塔卡令人惊讶地缺乏鱼类遗骸作了评论,并下结论,认为冰后期伊始河水的温差可能阻碍了淡水鱼类在遗址附近出现。尽管动物群中有某些以鱼为食的鸟类的事实,但是这一观点仍然存在。皮茨的一篇重要文章认为,斯塔卡专门加工鹿角和鹿皮的地点。他的观点主要根据器物组合中刮削器和雕刻器比例较高,以及邻近遗址的水域中有大量鹿角。皮茨还质疑该遗址为冬季居住的推测,并再次强调,证据表明斯塔卡有可能是全年居住的。此外,根据遗址中的遗存,他注意到植食在食谱中可能很重要。

安德森等人也重新评估了斯塔卡,却得出完全

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遗址的证据表明它基本上是小群体在一年中多次短期使用的一个狩猎据点和屠宰场。恰恰相反,我认为斯塔卡根本不是一个聚落或据点,而是一处垃圾场,是一处早已消失的聚落在附近水域中堆积的废弃物。遗址中大量的重型工具和其它人工制品,以及保存良好的骨骼、鹿角和木头(表明了厌氧环境)支持了水域堆积的观点。类似的水下分布方式见于整个北欧和中欧的其它沿海遗址。

斯堪的纳维亚南部 近十年来,北欧中石器时代的发现和重新阐释进展很快。该地区的两篇主要总结已经需要做重要的修订和补充。虽然邻近地区有许多有趣的项目,但下面的讨论将集中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研究。

该地区冰后期初的环境与考古记录得特别好。中石器年表通过放射性碳断代、孢粉分析和器物类型学得到确立。现在,丹麦中石器时代大体分为三期,并至少可再细分为10段。马格尔莫斯时期定在9500~7700年前,以各种细石器武器为特点。最近的遗址报告证实了该时期的聚落遗迹。这些遗址大多数是夏季的湖边聚落,有大量的鱼骨,偶尔有小茅屋的居住面。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达文西(Duvensee)I可能代表了马格尔莫斯时期的一个小型秋季营地。该遗址为一块有大量榛果壳的房屋地面(3×5米)。

距今7700~6600年的孔格莫斯时期,部分以菱形箭镞的出现来定义,后继埃尔特伯尔时期则以各种横刃箭镞为特点。孔格莫斯遗址几乎无一例外见于沿海,并含有海生与陆生动物群遗存。最近对瑞典斯堪尼亚西南部塞格布洛(Segebro)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这些海滨孔格莫斯居址的性质。

距今6600~5300年的埃尔特伯尔时期,为该地区整个中石器时代大量显见趋势的顶峰。该时期遗址类型差异最为鲜明:(1)沿海的长年大型居址,含海生和陆生动物群,或有贝冢共生;(2)小型的季节性海滨遗址,觅食重点更加特化——一般捕猎深水鱼类、海豹或迁徙的水禽如天鹅;(3)内陆的诱捕地点,有大量毛皮动物的完整骨骼(特别是松貂);(4)大型内陆遗址,似为夏季居住;(5)全年居住的内陆湖岸大型聚落。对日德兰半岛中部灵克洛斯特(Ringkloster)的研究证实了最后这种类型。

觅食活动的强化可以追溯到丹麦的中石器时代。孔格莫斯时期出现了贝冢、各种觅食营地、大量海生鱼类与哺乳动物遗存(包括海豹、海豚和鲸)、

以及专门诱捕某物种的地点使用,所有这些见证了一种日益多样化的维生基础。埃尔特伯尔遗址的物种数量较先前的马格尔莫斯时期增长了近50%。许多新物种来自海洋生境与深海区域。对韦德比克(Vedbaek)墓葬人骨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其食谱类似于格陵兰岛爱斯基摩人,他们主要依靠海产维生。

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中石器的发展,明显与技术的复杂化相伴。晚期比早期出土更多器物类型与设施,以及较复杂的设施。以前的类型在功能上更加专门化,而且出现了全新的类型、材料和技术。到埃尔特伯尔时期,使用的木、骨和鹿角器极为多样化。该时期陶容器的出现为这种发明提供了相当生动的佐证。长达10米独木舟形的船只能运送人员和物资。这种巨大的技术变迁,无疑反映了一种资源采办和利用的强化。

与历史上将中石器时代看作是“缺乏艺术”的图像相反,装饰艺术和装饰品出现在整个丹麦的中石器时代。琥珀小塑像和坠饰非常著名。装饰有典型几何形纹的各种材料和器物,贯穿整个中石器时代。但是到埃尔特伯尔时期,特定图案可以分辨出明确的分布区域,覆盖区域的半径达100公里。此外,在新材质——木头上用独特技术制作的一种全新非几何形纹饰,最近见于饱水的曲布林韦格(Tybrind Vig)遗址。本地无法获得物品的出现,见证了舶来品的交换,埃尔特伯尔时期出现了用西兰岛灭绝动物牙齿制成的饰物和鞋楦形闪岩手斧,它们源于波兰西利西亚地区的多瑙河文化。

距今5300年左右驯化物种的出现,标志着埃尔特伯尔时期的结束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新石器农业村落的开始。从渔猎适应向农业转变的性质仍然是北欧史前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顾与展望

四十年前戈登·柴尔德论述道:“与已逝的时代相反,中石器社会给人留下了一种极端匮乏的印象。”约二十年前,两位杰出的欧洲史前学家写道:“西欧大部,还有中欧和俄罗斯南部,无论新暖期开始的气候在我们看来多么宜人,直至新石器的传播时期,它都是一种文化衰落。”

今天,这种有关“文化衰落”或史前记录存在中断的论述,对我们理解冰后期初已毫无意义。确实,观点发生了截然的变化。今天,有些作者认为中石器时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或“中石器时代远非死胡同,它实际上是文化发展根本变化的重要

序幕”。虽然这些论述有忽视旧石器晚期业已出现的许多重要发明的倾向,但是无疑的是,中石器时代见证了欧洲史前史的重要一环,而且它并不是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断层或“间隔”期。

下面是有关欧洲中石器时代人类适应动态特征讨论的某些相关主题。在许多区域都可以追溯技术、聚落、生计、人口和群体结构的变迁。

技术在运输、工具和生计采办方面向着更高效的方向发展。维生装备,包括工具和设施,在形式上变得更多样,在功能上更加专门化,在数量上更丰富。渔猎装置的丰富令人难以置信,包括网、堰、叉、钩和带倒钩的鱼叉。磨制石器首次出现,主要为斧子、镑、植物加工设备、以及其它工具。北欧这时期有大型独木舟和雪橇。投射武器的端部装有各种用骨、木、角和石头特制的箭镞。在许多活动中,其它打制石器工具的作用开始降低,成为制作木器、骨器和鹿角器的工具,后者是直接用于采办食物的工具。

根据聚落内部结构和利用遗址与地点的种类与数量来看,聚落变得更大,使用时间更长,差异更明显。大型的共同居住群和永久性居址在某些地区是中石器聚落的标志。虽然只有少数居住结构被定为该时期,但各种设施和其它构造表明人的活动更加专门化。聚落位置明显与资源的性质与分布相关,最常见于海滨、湖岸、或河湖的方向,并伴随着对水生资源更大的依赖。

维生活动在中石器时代似乎得到极大地强化。资源采办变得更加专门化和多样化——就觅食的性质、技术和组织而言更加专门化,就被利用生境和物种的数量与种类而言,则更加多样化。几乎在所有地区,纳入食谱范围的物种数量远远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所见。在中石器时期,某些资源也变得更常见——尤其是坚果和贝类,但是这种习见反映了食谱更加多样化,而非主食的改变。普遍加入食谱的有(1)营养级别较低的食物,(2)需要更加复杂加工技术的食物。

众所周知,人口和社会结构是考古学上难以记录的人类行为方面。但是这些情况的图像可能反映在史前社群边界的性质和规模上。在北欧,边界和群体规模的证据是令人感兴趣的。在旧石器晚期之末,三个主要“社会区域”可以在尼德兰、波兰和瑞典南部接壤的大片区域中被确定。阿伦斯伯格、希维德、和布洛默“文化”覆盖的面积平均约100,000平方公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全新世初,这些社会

区域在范围上缩小。到大西洋期,在同一地区通过器物形制或原料的特征定义,可观察到十五个或更多这样的单位。这些单位规模与位置的证据来自低地诸国表面修整箭镞的分布、比利时和荷兰南部沃默萨姆石英岩的有限分布、日德兰半岛埃尔特伯尔艺术的设计母题、前东德带倒钩骨质尖状器的独特类型、细石器形状和尺寸的变异、以及波兰特殊来源的“巧克力火石”的分布。到中石器后期,这些“风格区”的范围约15,000至20,000平方公里或更小。这些单位规模的历时缩小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人群在规模、密度和组织特点上的变化。

同时,“风格”变异或地域性的某些表现变得更加有限,其它的“信息”类型显然在整个欧洲传播得更快。在中石器时代之始,整个欧洲大陆发现各种相当简单的投射尖状器,大多源自旧石器晚期的式样。在大多数组合中,这些早期式样在北方气候期很快就被三角形细石器所取代。随后,约8000年前,梯形细石器同样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欧洲南部似乎略早一些。在众多类型中,梯形细石器常常是中石器晚期的标志性器物。

虽然最近的看法倾向于栽培或畜牧是在欧洲中石器时代本土背景中出现的,但是尚无确凿证据表明本土驯化的存在。相反,中石器时代的结束以一种快速传播过程为标志,至少部分是这样,有点类似于投射尖状器类型的传播,但是在西南亚产品的案例中却并非如此。约8000年前,使用陶器的农民出现在爱琴海与巴尔干半岛。同一时期,心形印纹陶和羚羊(ovicaprines)几乎同时出现在地中海北岸,经常与其他方式的中石器时代居住层直接共生。

然而,农业经济的进一步扩散颇为起伏和零散。中欧直到6500年前才经历“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要5500年前之后才抵达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

事实上,农业经济向欧洲传播的惊人事实不是其快速的扩散,而是在某些地区出现的滞后。新石器时代在中欧、大西洋和西北欧开始得较晚,不是因为蜂拥而来的农民耽搁了时间,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狩猎采集的成功适应阻碍了一种劳力更加强化的生计,直到全新世大暖期最佳环境结束为止。

欧洲各地区,从中石器时代觅食向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过渡,体现了人类适应延续性的独特性。中石器时代的终结并非是由于外来农民的高歌猛进,而往往是反映了业已存在社会对变化环境的重新适应与调整、以及实践新的维生方式的一个时期。



本期导读

一、《欧洲的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美洲这一阶段被称为古代期(the Archaic Period)。但是,中石器时代概念在中国仍未被普遍接受,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1)意识形态倾向,选择西方学术概念有时犹如选择党派和信仰。(2)习用的类型学、地层学、年代学和文化面貌上难以对这一时段做统一界定和比较研究。(3)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分属不同的研究机构和领域,使得这一重要的转变时期被忽视。(4)新旧两个石器时代“成就”可观,文化特征鲜明,而中石器文化则乏善可陈。结果,全新世初的所有遗址都被归入“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之一——农业起源研究的关键时段,近来见证了我国学界对这一“过渡期”关注的升温。不管我们对中石器时代这个术语是否认同,但是国际学界研究的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1)过去这一时代以细石器、弓箭和狗的驯养为标志,但目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冰后期全新世开始到和农业引入之间的一段渔猎采集适应,表现为一种与新旧石器时代十分不同的广谱革命。(2)柴尔德早就用农业革命来定义新石器时代,并被国际学界一致认同。因此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也应采取经济学而非器物学的标准。(3)该时代是冰后期人类对环境巨变的重新适应,各地气候环境差异极大,适应方式也极其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单靠类型学的器物分析已不能胜任这一课题的研究。(4)各地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过渡差异很大,时间的长短也各不相同。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可能是旱地作物和稻作起源的主要区域,过渡期可能较短,而北方寒冷地带(农作物难以生长)和华南热带地区(野生资源丰富)农业可能出现很迟。(5)应该重视文化生态学的生计适应和人地互动研究,探究不同地区是如何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转变的。(6)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着人类在整个中石器时代的适应性调节,我们应该设法了解不同地区的先民是如何根据当地的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慢慢驯化或引入动物和农作物,进而完成经济转型的。(陈淳)

二、《环境、文化及保存状况与聚落形态研究》

遗址资源域分析(又译为“遗址领地分析”或“遗址域分析”),是一种西方考古学界应用很广泛的关于遗址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它的英文表述有两种,即 Site Catchment Analysis(简称 SCA)和 Site Exploitation Territory Analysis(简称 SETA),前者是维塔芬兹等人 1970 年最初创用时的名称,后者是贝利等人在 1983 年提出的新名称,所指都是同一种分析方法。

遗址资源域分析是指通过对遗址周围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分析,来恢复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范围和获取资源的种类和途径,进而考察人地关系演变。简单说,就是通过调查遗址周围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分布区域,来复原遗址占有的领地。这一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开发利用周围的环境资源是以减少所需时间和能量的合理方式进行的,换言之,离居住地越远,获取资源所需时间和能量就越大,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就越小,最终到达无开发价值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构成了古人日常生活范围即遗址资源域的范围。显然,其核心是确定遗址资源域的范围和域内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

按照这一原理,其工作程序主要有两步:首先根据现代原始部落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适用于古人日常生活范围的理论模式,具体是农耕定居社会以 5 公里或步行 1 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狩猎游动社会是以 10 公里或步行 2 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这一模式已被西方多数遗址域分析所通用(有的则做小幅调整);再据此进行实地调查,根据遗址性质的不同,从遗址中心出发向不同方向步行 1 小时或 2 小时,记录并分析沿途观察到的资源分布和土地类型、地貌景观等,由此可建立一个以遗址为中心的不规则圆圈(受实际地形影响,其范围通常会与理论圆圈有所出入),这个范围尽管是以现代当地地理环境为依据的,但仍可视为古人获取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自然资源的最可能范围,即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范围——遗址资源域。对一个地区的多个同时期遗址开展遗址资源域分析,就可恢复整个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控制的方式、范围以及人地关系演变。

因为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聚落考古和区域覆盖调查的兴起,部分地区经过细致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大量特定时期共存的先秦遗址,再加上此前进行的全国范围文物普查,都为遗址资源域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已有的聚落考古多是从遗址内部的面积等角度进行等级划分,而已有的环境考古也限于遗址内部的取样分析,都是孤立地看待各个遗址,缺乏走出遗址的意识。而遗址资源域分析的精髓就是提倡走出遗址,并且提供了可以实地操作的野外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倡导将出土遗存整合在一个超越单个遗址的更加广阔的空间环境之中,将人及其聚落等文化景观还原到整个自然环境的地理景观当中去研究,充分重视对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重建的古代人地关系演变过程更加细致,也相对较为可信。因此,这一方法在我国应该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如果能不断实践,将会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王青)